红楼艺文有新研

赵建忠

音乐与文学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走向融合,形成了难以分割的音乐文学,其容纳的艺术形式包罗万象,依庄捃华《音乐文学概论》的界定,凡与音乐结合以声乐作品所呈现出的文学样式均属音乐文学。根据不同的表演方式,可细分为狭义音乐文学、戏剧性音乐文学、说唱性音乐文学等,其中说唱性音乐文学又称为“曲艺音乐文学”,专指与曲艺音乐相联系的艺术作品。

从地域角度划分,曲艺音乐可分南北,各具特色。北方的表演方式热情奔放,曲本内容通俗易懂;南方的表演方式含蓄内敛,曲本内容温婉柔美。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曲艺在传播过程中与古代小说形成了交汇影响。明清时期,小说已成为一代文学,“文备众体”的特征使得文本“容器”可以渗入各种艺术形式作品,从中吸纳有益养分,运用到人物塑造、情节演进的创作环节中。在曲艺音乐与明清小说的交汇影响方面,《红楼梦》最具代表性,但由于其雅文学的性质导致了曲高和寡,曹雪芹的作品开始也仅被文人墨客及贵族子弟追捧,其传播范围受到相当的限制。直到北方说唱艺术子弟书盛行,《红楼梦》才更大范围普及到了民间,随后南方曲艺中也有《红楼梦》题材的作品问世,且多以弹词开篇、木鱼书等形式传播。这些曲艺作品唱词对《红楼梦》人物的褒贬、情节的选择与安排、思想情感的传达,反映出改编者的伦理观,在传唱《红楼梦》的同时也传达了改编者的人生感悟,如被改编为曲艺唱词的“黛玉焚稿”“黛玉葬花”“贾宝玉夜探潇湘馆”等经典情节,被广泛传唱后进一步扩大了曹雪芹原著的影响,也加快了高雅文学与民俗音乐融合的进程。

前人对南北两个重要分支曲艺音乐文学中的鼓词、子弟书、弹词、木鱼书等《红楼梦》曲艺题材分别进行过研究,已取得丰硕学术成果,但对《红楼梦》曲艺音乐文学的南北流变方面,尚无系统深入的研究。来自内蒙古草原的吕笙,师从曹宏凯教授获得天津师范大学艺术学硕士学位后,又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她结合自己硕士阶段所学的专业,将音乐与文学两种姊妹艺术打通。她对《红楼梦》曲艺音乐文学投注了很大精力,将这个课题作为博士论文,抽出个别章节的文字发表在《红楼梦学刊》等核心期刊。博士毕业后又在其论文基础上扩充成专著《〈红楼梦〉曲艺音乐文学南北流变》,最近已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此书以曲艺音乐文学为切入点,汇总南北方现存曲艺音乐作品中《红楼梦》题材的唱段、唱词、演出、艺人等,梳理分析了《红楼梦》鼓词、弹词、木鱼书等说唱文学在现代曲艺音乐中的流变与传播,从曲艺音乐的文本考察,旨在研究《红楼梦》题材中的曲艺音乐唱词的语言艺术,剖析曹雪芹原著的情节事件、人物性格、文化背景等在曲艺音乐唱词中的体现。作者整理了《红楼梦》曲艺音乐文学在南北流变过程中新旧唱本的唱段更迭,分析南北方曲艺音乐文学的创新与借鉴、不同曲种中的沿袭与发展,以及曲艺艺人、创作者们对《红楼梦》曲艺作品的思考。她还绘制了《红楼梦》曲目一览表和曲艺音乐事件年谱,运用传播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研究方法,借鉴音乐学、曲艺学理论,探讨《红楼梦》的传播价值、审美价值、民俗价值等,试图归纳出《红楼梦》曲艺音乐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以期为许多正濒临灭绝的曲艺曲种提供有效的生存发展空间。

此书对天津的《红楼梦》曲艺音乐作品进行了重点梳理,并结合津沽文化特色进行了深入考察。此前,我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林海清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天津红学史稿》中,也是将天津文化元素与《红楼梦》交融研究。近代以来,天津形成了雅文化、洋文化、俗文化并存的丰富形态,《天津红学史稿》就《红楼梦》与这三种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作为“曲艺之乡”的天津,这块土地上诞生的《红楼梦》曲艺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红楼梦〉曲艺音乐文学南北流变》能在这方面有所拓展,对于多视角审视《红楼梦》曲艺音乐文学的南北传播问题,具有作品个案解剖的意义和学术价值。相信吕笙今后能在自己开辟的领域继续挖掘,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果。

天津工业史话(十一)

近代天津的硫酸工业

杨楠

沽上丛话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纷纷兴办实业,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天津出现了华北地区第一家由国人开办的硫酸工厂——利中酸厂。

利中酸厂的创办人赵雁秋,早年从北京工学院化工系毕业后,先入仕途,后因故乡东北沦陷,毅然弃官从商,决心实业救国。化工专业出身的赵雁秋认为:“酸碱为工业之母,没有酸碱工业,其他各种工业就不可能独立发展。”(赵慎五:《与日商争夺市场的利中酸厂》)当时,天津的硫酸市场被日本人垄断,赵雁秋决定在天津开办酸厂,发展中国人自己的硫酸工业。

利中酸厂的创办面临着重重困难。首先,工厂缺乏化工专业技术人才。赵雁秋最初打算聘请德国工程师,但德国工程师开价昂贵,赵雁秋遂向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张子丹求助。张子丹教授推荐了自己的学生蒋子瞻,由其负责利中酸厂的关键技术;同时,张子丹以南开大学化工研究所的名义,随时协助解决利中酸厂遇到的技术问题。

其次,利中酸厂的制酸设备购置难。利中酸厂建厂之初,制酸设备短缺,当时全国仅有山西太原兵工厂下属的硫酸厂及上海的开成酸厂(中国第一家由国人创办的酸厂)的建厂经验可供参考。由于赵雁秋曾在阎锡山手下做事,他利用其人脉关系安排蒋子瞻前往太原兵工厂了解情况,搜集相关信息。上海开成酸厂的负责人吴蕴初,对赵雁秋在天津创办民族硫酸工业非常欣赏,他从生产设备、制酸技术等方面给予利中酸厂以适时的协助和支持。太原兵工厂和开成酸厂采用的都是铅室法制酸,赵雁秋在对两家的生产设备与生产流程进行认真比较后,在借鉴二者合理而经济的技术与流程的基础上,制定了天津利中酸厂的制酸技术方案。

再次,制酸原料的短缺。酸厂所需要的生产原料主要是硫化铁矿石,国内的硫化铁矿分布在安徽、浙江、广东、湖南等地。这些硫化铁矿虽然产量高、质量好,但产地主要集中在华中、华南地区,地处华北的利中酸厂面临着运输难、费用高的难题。除了硫化铁矿外,产自于煤矿中的煤质硫化铁也是制酸的原料。河北、山东的煤矿都出产煤质硫化铁,只是由于其价值较低,因此产量不大。赵雁秋便利用利中股东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关系,决定采购宣化的铁矿,后来由于宣化铁矿含硫量不高,最终未被采用。为此,赵雁秋又联系了山西阳泉的煤矿,由于该矿的煤质硫化铁仅仅能够满足太原兵工厂的需求,最后只能放弃。经过多地勘察与比较,赵雁秋最后从河北开滦林西矿、柳江矿及山东博山煤矿购买煤质硫化铁作为制酸原料。

利中酸厂创办之前,天津以及华北地区的工业硫酸都需进口,硫酸市场一直被日本人垄断,当时垄断天津市场的主要有三井、三菱、住友三家日本公司。天津当时有许多日本供货商,这些买办在天津销售各种日货,比如号称天津“硫酸大王”王五生的隆记公司,就专门经销日本工业品和工业原料。隆记公司资金雄厚,业务范围很广,进口日货的种类繁多,几乎操控了天津的硫酸市场。

利中酸厂创办后,立刻遭到日本人的疯狂打压。利中开工前,天津每箱硫酸市价为64元,等到利中出货时,日商及其买办已经把硫酸的价格降低到每箱14元。日本人还恶意中伤利中硫酸,说其质量远不如进口硫酸。由于日本人的疯狂压价以及恶意宣传,天津各行业的硫酸用户都大量囤积低价的进口硫酸,使得利中酸厂从1934年下半年(建厂)到1935年上半年,积压了大量成品,资金难以周转,处于危机之中。

日本人及其买办除了用经济手段打压利中酸厂外,还大肆制造舆论以迫使利中停产。1935年,由于利中酸厂蒸浓设备不够完善,导致生产过程中酸雾扩散不开,对工厂附近的环境造成了污染。问题发生后,利中马上对设备进行了改进,但日本人及其买办却煽风点火,鼓动酸厂附近居民去政府请愿,最后导致利中酸厂被迫停产。后经多方斡旋,利中在改进蒸浓设备之后,才逐步恢复生产。

在与日商的斗争过程中,利中酸厂没有退却。他们首先从宣传工作入手,变被动为主动。他们主动向用户说明国产硫酸的种种优点,特别阐明国产硫酸的质量标准也是66度,和进口硫酸性能完全一样。利中把用酸量大的金店业和漂染业作为公关对象,派蒋子瞻去金店帮他们试用利中硫酸化炼金银,并从用过的废液中提炼金银降低损耗。经过试验,使用利中硫酸所化炼的金银制品的质量、成色与进口硫酸完全一样。从此,利中酸厂和金店业、漂染业建立了牢固的业务关系,打开了市场。

此外,利中也与日本人打起了价格战。由于日本硫酸的进口成本较高,国产硫酸在价格上有着先天优势。此前,天津的日商买办已经把进口硫酸的价格由每箱64元压到14元,利中考虑到国产硫酸的成本每箱大致为8元,遂把市场价格定在每箱12元,与进口硫酸相抗衡并占据优势。日本人不死心,他们通过走私、偷运等非法手段,逃避关税,把硫酸降到每箱10元。利中也再度降价,降为每箱9元,日本人无计可施。至1935年冬,利中硫酸成功占领了天津市场,进口硫酸彻底销声匿迹。

赵雁秋作为爱国实业家,其创办的利中酸厂在日本人的疯狂打压下成功占领了天津硫酸市场,并将进口硫酸赶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极大地鼓舞了民族士气。利中酸厂作为民族化工业企业,奠定了天津近代硫酸工业的基础。

王焕墉先生的集外诗

魏暑临

王焕墉先生是天津当代著名诗人,曾师从寇梦碧、张牧石等先生,是天津重要诗词团体梦碧词社及梦碧后社的骨干成员,多数诗词在其生前辑为《崇斋诗存》《知月词》行世。

近日偶然见到一封陈机峰(宗枢)先生寄给王先生的手札:“焕墉同志:久未晤谈,甚念!春节将临,颇思与诸词友一聚。兹定于正月初三日晚(星期六)在舍间与寇、张二公小聚,请六时左右莅舍。备有薄酌,勿却为荷。此致敬礼。陈宗枢。1月30日。”按照时间推算,此信应写于1981年或1984年。当时,陈先生和寇、张二位先生同声相应,常雅集联句、共作诗钟,而王先生作为寇、张二人的弟子,也常参与其中,过从紧密。王先生对陈先生推崇备至,其《知月词》中录《瑞鹤仙·寿机峰词丈》一首,有句云:“尘中自耿,天心月,一般净。乱尘多歧路,梦程天阔,悄把残春支靖。一江风、吹上华堂,篆扬寿鼎。”赞美陈先生虽遭遇坎坷,但仍能自守高洁,怀抱雅操,以享遐龄。所谓“一江风”兼指陈先生早年参与发起天津著名昆曲社“一江风曲社”,借以代表他曲学的成就。

同时又见到王先生诗稿一纸,题为“悼陈机老三首”,正可印证他对陈先生的景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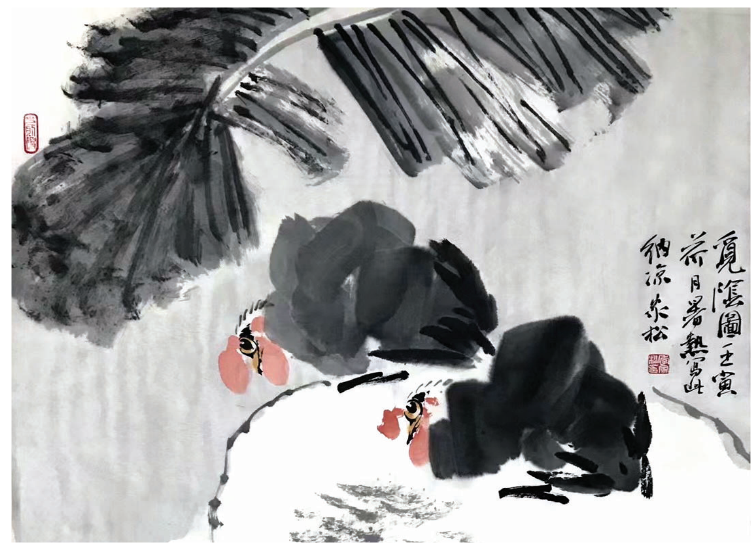
其一:“苍狗蓬莱是旧身,莲花池畔净无尘。琼楼不用迷离语,笑向词兄多一人。”附注:“陈翁长寇翁几岁,但寇翁先谢世。”

其二:“岁岁联吟别有天,梧桐斜月隔寒烟。三公今剩一人健,最惜曲声过酒筵。”附注:“寇、陈、张三公于每岁正月初五日在舍下小聚联吟。拙作《辛亥冬至后二日吟侣小集双梧馆》一诗以记其事。酒后寇公唱京韵一段,陈公唱昆曲《林冲夜奔》一段,张公唱单弦《风雨归舟》,至月色催人,诸公方归去。此亦一时之乐邪。”当时王先生家门前有梧桐树两棵,故自榜斋号为“双梧馆”,因而有“梧桐斜月”一说。而诗中所谓“三公今剩一人健”指当时张牧石先生尚健在。张先生去世于2011年,陈先生去世于2006年,可知这组诗写作的大概时间。而注文中对当时雅集况味的简要描述,读之令人神驰不已。

其三:“苦日飞声谱涧泉,北邙人去自安眠。春风也助多情树,吹落榆钱作纸钱。”附注:“陈公旧宅在今进步道,道边多种榆树。宅为两层小楼,公居楼上,时有玉笛之声暗飞。”注文原作:“玉笛之声常暗飞,散入东风满津城者也。”大概是为了词句精炼,遂为删改。而当时陈先生的曲名,可谓驰誉海内,又何止是满津城而已。

另有《谢周退老赐横额二首》诗稿一纸,诗云:“出没云间陆士龙,两番书喜故人逢。横颜若挂春山上,化作人间五老松。”“赐我彩笺壁上悬,千山难隔梦相连。春光玉骨由公寄,怪底书房响夜泉。”周退密先生是当代学界耆宿,与吴祖刚、喻蘅、田遨合称为“海上四老”,早年与京津诗家多有唱和。王先生与周老本不相识,而词人赵连珠先生与周老熟稔,曾代请周老为王先生题写“知月书屋”匾额。《崇斋诗存》录有《赠退密词丈》诗一首:“花间意趣世无双,小令怡情过大江。求得星珠光四壁,恰如初日上心窗。”在修辞和气象上,略显泛泛,美感似不及“挂山松”“响夜泉”之神采与音响。

当年《崇斋诗存》《知月词》合编为《崇斋诗词》出版之前,我曾参与校订并加注释,今日得见集外之作,颇感亲切,记录于此,以播诗林。



觅阴(中国画) 季家松

天津民俗学会之肇始

由国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文化事业蓬勃进步,民俗学也萌发了新的生机,这与钟敬文、白寿彝等老一代专家学者大力倡导密不可分。1985年天津市领导主持修建古文化街、复建娘娘宫,并于1986年元旦对外开放,为天津成立民俗文化社团带来良好契机。

在钟敬文的直接关心、指导下,天津文化人士开始酝酿成立民俗学会,1987年4月21日至25日首次筹备会召开,商定由周骥良、李世瑜、顾道馨、王翁如、冯育楠等九人组成筹备组,负责前期相关工作,起草章程草案等。值得一提的是,筹备会期间当时已84岁高龄的钟敬文以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的身份来到天津参观指导,在座谈会上,钟敬文结合中外人文思想、社会文化研究历程、天津民俗特点等进行了阐述,并对学会的成立与发展提出希望。接下来的两个月,学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推进,继续讨论、修改了章程草案,提出成立学会的报告,反复酝酿研究了理事候选人、第一批会员名单,以及成立大会的各项细节等。《天津市民俗学会章程(草案)》分为总则、任务、会员、组织、经费、会址等六章,学会是“天津市研究民俗的群众性团体”,会址设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天津分会”。

1987年8月20日天津民俗学会成立大会在市政协礼堂召开,中国民俗学会发来贺词,钟敬文写来贺信,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张紫晨到会讲话,他说:“全国省一级的民俗学会虽然成立的已有不少,但直辖市成立民俗学会的,天津市还是第一个。大都市的特定的文化区域在民俗的建设和研究上是很重要的,天津市的这一举动可以带动其他大都市在民俗方面的发展。”

经大会选举通过,名誉会长为冯骥才,会长由周骥良担任,副会长为李世瑜、王翁如、顾道馨、高志明、冯育楠(兼秘书长),另设理事19人。天津民俗学会首批会员91人,主要来自民俗文化工作者、民俗学教育研究者、民俗文化挖掘整理者、民俗文艺作品创作者。周骥良在闭幕词中说,各位会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希望大家在规划表上写出一年中为学会做些什么,大家动手,每人做一件,就是八九十件,“从小到大,从浅入深,我们会把天津的民俗宝库打开的”。

满庭芳 第五〇六四期

---

5 未敢忘忧国

天生是配角
律师文化纵横谈
杨仲凯
作家出版社

律师这个行业,天生和政治有关,律师中的很多人有政治热情,也可以说律师的很多工作是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来完成的。比如说,律师为政府担任法律顾问,在完成法律建议的同时,实际上这也是律师在参政议政的表现方式。一条路该不该修,车票该不该涨价,这些都是民生问题,而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有人片面地认为,律师参与政治就是当总统或者做官,并举例说美国一半的总统是律师出身,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是每个人的国家,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参与。从这个角度讨论政治,才是公民切入国家建设的最好视角。

每人都能参与,更何况知识分子,即使在封建社会里,读书人从骨子里崇尚“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到了当今,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国家也广开言路,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的渠道很多,律师是知识分子中懂得法律和运用法律的人,既能贴近民生,又能关联上层建筑,所以律师在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方面,是有重要作用的主力军。近年来,党中央多次召开统战工作会议和新阶层工作会议,律师作为重要的统战力量更多地介入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律师担任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人数逐届显著递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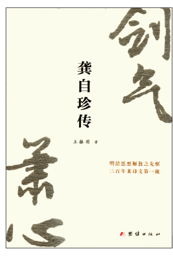
实际上,中国的律师是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章士钊大律师当年资助过毛泽东搞革命,而刘崇佑大律师也帮助过周恩来,不仅为周恩来在天津搞学生运动时被反动派抓捕而辩护,还对周恩来出国勤工俭学进行过资助,这都是不应该忘记的律师功绩。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和司法部长史良都曾经是律师出身,都是在上海执业,他们为了民族解放和振兴,都做了有益的工作,帮助共产党做了很多事。

有人讲中国的政治界没有学法律的,这样说就太片面了。中国的律师早就担任过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董必武不仅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还曾经一度担任过代理国家主席,鲜为人知的是,董必武不仅是法律科班出身,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律,而且他是一名地道的律师,他于1917年在武汉与人合伙开办律师事务所。最高人民法院后来的院长任建新,曾是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之后的一号律师证的持有者。

现在很多的律师事务所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甚至比谁的办公室面积大,其实律师行业就是个服务业,跟那些商业机构,怎么好比呢?律师这个行业,是有家国情怀的,律师的获得感和存在感,其实在于自己的建议被采纳,无论是个案中的法律意见被法院或者其他机关采纳而帮助了别人,还是治国理政的建议和提案被国家所用而泽惠苍生,这都是“士”的追求。

---

37 龚自珍正式定名



龚自珍传
王振羽 著
团结出版社

“海红红处,愁煞人情绪。画里声音诗里句,觅了一回无语。绣窗金额楼东,是他和雨和风。谁教隔墙如火,到春到夏能红。”

王昙吟罢神色黯然,就在西直门外和阿珍作别,径自去了。龚自珍这位年轻的世家子弟从王昙身上初步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和天道的不公。他忽然恐惧地想到,这样的厄运会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呢?人生真是太可怕了。

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阿珍年已十九岁。按古礼,明年就该举行加冠礼,何况今年要参加乡试。父亲给他正式定名自珍,并给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写信,请他给自珍取个表字。

自从去年春天和王昙同游翠微山后,王昙时相过访,和自珍遂成忘年之交。他在自珍书房里,看过自珍写的功令文和策论之后,诚恳地对自珍说:“世兄家学渊源深厚,外祖父段先生海内名家,加上自己独具的禀赋,文章才气横绝一世,笔锋凌厉,辞气雄健,罕有其匹。但锋芒太露,缺少雍容之气,科场之中,恐遭人忌。我是过来人,老马识途,不能不向您陈一见之愚。”

自珍点头称是。但又笑着说:“山水易改,禀性难移。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操切之性要想雍容怕也难呢。”

有一次王昙告诉自珍,他又去过翠微山聚岚观几次,始终没有见到矮道人。不过倒结识了矮道人的徒弟杨湛卢——就是那次他们见到的那个道士,现在道号丑面道士,学问十分渊博。自珍谨记父亲的告诫,不愿说破龚家和杨湛卢的渊源。王昙走后,自珍又感慨起来:自己涉世不深,所知十分有限,但已经知道两个有用之才被摧残,被埋没。全国之大被埋没的有用之才何止王昙、杨湛卢两个!“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这话一点不假!他多么希望《礼记》中说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社会能够早日实现。到那时王昙、杨湛卢这样的人再也不会无辜受害,被埋没摧残了!

六月九日,自珍夜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他来到一个地方,但见“云廊木秀,水殿荷香,风烟郁深,金碧嵯丽。时也方夜,月光吞吐,在百步外,荡瀣之气空蒙,都为一碧,散清香而离合,不知几重”。一个人告诉他说,这就是光明殿。梦醒之后,他反复寻味,这“光明殿”不正是玉皇大帝居住的地方吗?如人世间像光明殿那样充满光明该有多好!人主能像天帝那样公正无私,明鉴万里,人世间就不会有奸邪当道、无辜受害的事情发生了!转而又想,光明殿里为什么也会“荡瀣之气空蒙”呢?

---

37 女朋友学中文

妈妈不告诉我
肖克凡 著
作家出版社

我跟中文系女生韦华谈恋爱时,是在读大三,26岁,属于适龄青年。她知道我父母离异,喜欢询问我的家庭情况,说要写作就得保持好奇心,这样,你的世界就会比别人丰富。她喜欢读《简·爱》和《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包法利夫人》。我告诉韦华,我父亲曾经流露出悔意,请我捎话向母亲致歉,可惜母亲没有回应,于是局面难以盘活。韦华听了非常焦急,仿佛是她父母离了婚,为我构思多种方法以求破局。我为此感动,主动带她去见我的师傅,一是让她接触民间历史学家,二是让她听到我母亲的故事。

刘乙己表现出罕见的热情。我家的故事纷繁复杂,涉及人物不少,事件脉络散乱,情节重叠悬疑……没想到这些都被刘乙己说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毕竟是高考辅导班老师,练就了超常的概括能力和逻辑本领。我的女朋友则具备出众的理解能力,她听罢异常兴奋,转而问我:“既然推断你母亲没有历史污点,应该让她振作精神,大步走进新生活!”我回答:“我们研究历史格外谨慎,一个人物的漏洞可能改变事件真相,所以不像你们学中文的,依靠虚构创造新世界。”

韦华便转向刘乙己,心情急迫地问道:“刘乙己先生,您能举例说明吗?比如,是什么漏洞改变了什么真相……”我打断韦华说:“你要称呼刘福禄先生,不要叫刘乙己。”韦华恍然大悟:“难怪我觉得跟鲁迅小说重名了……”刘乙己并不介意,完全沉浸在学术状态中说:“我给你举个现成例子吧。”说着,将目光转向我问道,“你姥姥没把闺女嫚儿送给宪兵司令,可是嫚儿偏偏承认去了高铁桥家。新中国成立后,还给惠生出具证明材料,以亲历者名义证明这是烈士之子,你说这逻辑能够成立吗?”韦华大义凛然地答道:“不能够,这里头肯定有故事。”俨然成为我的代言人。她不愧是思想解放时期的女大学生,性格耿直生猛。我想起自己的母亲,这位旧社会的女大学生,蒙受冤屈,饱经磨难,性格愈发内向了。

刘乙己表情凝重地说:“我们研究历史的讲究实证。国民党宪兵队半夜活埋田文佐,当时河堤下边另有目击者,那是个半夜看青的农民,名叫张仁国,新中国成立后参军立过三等功。他回忆跟田文佐同时被活埋的还有个姑娘,她身穿花布衣衫,挺直身板走路,毫不怕死的样子。”韦华瞪大眼睛望着我,明显吃惊不小。我当即请教师傅说:“如果这段口述属实,可以认为小树叶儿有下落了吧?”韦华充满历史责任感,初步显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气概,她说:“小树叶儿好像人间蒸发了,我们怎么向革命先烈交代呢?”